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孙光旭,李宝珠.胡适的现代翻译观[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4(5):120-124.

胡适的现代翻译观

孙光旭 李宝珠

(淮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摘要:胡适的文学革命纲领深受其翻译实践和世界文学观的影响,同时,其文学革命宣言也为现代翻译指明了方向。胡适主张翻译“欧西名著”为新文学创作树立典范,以白话翻译代替文言翻译以利于向国人进行文学启蒙,主张自由流畅、严谨有度的直译以达到对原文的忠实。胡适的文学革命观、翻译思想与策略,无疑是建构现代翻译规范的重要资源。

关键词:胡适;翻译;现代翻译观

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1)05-0120-05

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其文学纲领和文学实践中,笃行输入西方文化改良本土文化的原则,充分重视翻译西方经典文学的示范作用,在方向性的文学纲领和具体的翻译实践上,对现代翻译规范的建立功不可没。学界对胡适翻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翻译实践上,如涂兰兵讨论了胡适的翻译策略及翻译思想,^[1]王海霞与张威探讨了胡适实用主义思想对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影响,^[2]季剑青论述了胡适以《新青年》为阵地,如何从文学翻译走向文学革命的历程,^[3]屠国元分析了胡适译拜伦《哀希腊》蕴含的报国思想,^[4]等等。然而,鲜有学者探讨胡适对于中国现代翻译规范建构的贡献。本文拟以现代白话文学翻译为例,从胡适的文学纲领、翻译思想及翻译策略,探讨胡适对于中国现代翻译规范的贡献。

一、文学翻译与文学革命

胡适留美期间写成的《文学改良刍议》,是文学革命的第一篇纲领性文章,该文发表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胡适的文学革命创见,得益于他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考察,也得益于他对西方文学革命的总结及其文学翻译与白话文创作实践。这一点,

仅从当年胡适与友人谈论文学翻译与文学革命的书信往来中,便可窥一斑。应陈独秀之邀请,胡适翻译了俄国作家泰来夏甫(Teleshov)的短篇小说《决斗》,发表在《新青年》第2卷第1号上。他在邮寄这篇小说的附信中对陈独秀说:

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

译事正未易言。倘不经意为之,将令奇文瑰宝化为粪壤,岂徒唐突西施而已乎!与其译而失真,不如不译。此适所以自律,而亦颇欲以律人者也。……译书须择其与国人心理接近者先译之,未容躐等也。^{[5](P228)}

由此可见,文学翻译是胡适倡导文学革命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从观摩西方“名著”、师法“文学经典”入手,追求直译之“真”,且选择“与国人心理接近”的著作进行翻译,是为祖国“造新文学”的必经之路。首先,如果翻看《新青年》文学翻译作品,就知道所谓“与国人心理接近者”是哪些作品了,《新青年》成了白话文学翻译与创作的“实验基地”。在栏目设置上,《新青年》吸收了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的学生英语杂志的特点,把名著介绍与英语学习结合起来,左

收稿日期:2021-04-06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胡适翻译研究”(12500030);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皖人翻译史(1840-1949)”(AHSKY2016D120)

第一作者简介:孙光旭(1978-),男,湖北松滋人,讲师,主要从事翻译学研究。

右排版,英汉对照刊载西方名著。《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开始刊登关于西方名著的介绍性文字,如陈独秀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从文学文化进化论的视角,认为西方文学从古典主义开始,依次经历了理想主义、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等阶段,中国的文学仍然处于古典主义、理想主义阶段,接着介绍了欧洲著名的大文豪及其经典作品。^[6]“文学介绍”发展成为《新青年》固定栏目,这种传统一直保留到1919年,并为五四时期新文化刊物所效仿。如果翻看初创时期的《新青年》,就会发现陈独秀、胡适、陈赓、薛琪英、李青崖等人翻译的许多西方文学经典。

胡适的文学翻译实践与他的文学革命思想密切相关。《胡适日记》记述了胡适1907年读西洋小说的读后感数篇,这些西洋小说大部分是林纾翻译的,如《铁锚手》《十字军英雄记》《侠隐记》等。次年,胡适在《竞业旬报》上发表了翻译小说《生死之交》,又在《安徽白话报》发表了翻译小说《国殇》。1910年之前,胡适主要是出于生计问题而翻译,而1910~1917年留学美国期间,胡适对西洋小说的认知得以深化,并且产生了输入西洋文学以改造本土文学的文学革命思想。胡适给其族叔胡近仁的信中说,西洋小说无论是在“布局”还是在“状物”方面都做得很好,而中国小说只在“状物”方面见长。

事实上,胡适的文学革命主张是在1916年逐步提出的。1916年8月,他在给朱经农的信中首次提及“文学八事”。胡适在日记里记述了“新文学之要点,约有八事”:(一)不用典。(二)不用陈套语。(三)不讲对仗。(四)不避俗字俗语。(五)须讲求文法。——以上为形式的方面。(六)不作无病之呻吟。(七)不摹仿古人。(八)须言之有物。——以上为精神(内容)的方面。^[7](P399~400)在邮寄《决斗》译文之前,胡适在与其好友任叔永、梅观庄等人的书信往来中,已经屡次论及如何“造新文学”的问题。当年2月,梅观庄反驳了胡适的“诗国革命”始于“要须作诗如作文”的主张,认为自古以来,无论中西,诗文两途,分道而驰。胡适经过苦苦思索,认为“文字的形式往往可以妨碍束缚文学本质”,“历史上的‘文学革命’全是文学工具的变革”,“若近代欧洲文人都还须用那已死的拉丁文作工具,欧洲近代文学的勃兴是可能的吗?”^[5](P227)胡适纵观了古代文学的体式及文言的弊端,在进化论的启示下,他于当年6月中旬在波兰召开的“第二次国际关系讨论会”上,提出了“白话并非文言之退化,乃是文言之进化”的观点。^[5](P235)梅观庄认为胡适“功利主义”(Utilitar-

ian),“偷得”托尔斯泰(Tolstoian)的观点;胡适则指出,梅喜欢读批评家的言论,而没有去读“批评之文学家原著”:

凡世界有永久价值之文学,皆尝大有影响于世道人心者也……夫吾之论中国文学,全从中国一方面着想,初不管欧西批评家发何议论,吾言而是也,其为 Utilitarian,其为 Tolstoian,又何损其为是。吾言而非也,但当攻其所以非之处,不必问其为 Utilitarian,抑为 Tolstoian 也。^[5](P236)

由此观之,胡适的文学革命论已经具有世界性的文学视野,而非单纯吸收西方批评家的一家之言,强调了读原著的重要性。这正是他之所以强调“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的原因。期间,胡适仿照西方各类诗体,吸收中国白话通俗小说中的白话,尝试写了不少打油诗,如《和一百〇三年前之“英伦诗”》等,又受到了任叔永、梅观庄等人的指责,但胡适不以为然,仍然在尝试中思考文学革命的纲领。1916年10月,胡适给陈独秀写信,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八个条件,次月写成了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于1917年3月《留美学生季报》春季第1号上公开发表,1918年1月《新青年》上再次刊发。文中“文学改良八事”,第八条为“不避俗语俗字”,胡适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为文学正宗,皆因此类文学“不避俗语俗字”。接着胡适提及了我国古代文字向白话的演化与文学翻译的关系:

盖吾国言文之背驰久矣。自佛书之输入,译者以文言不足以达意,故以浅近之文译之,其体已近白话。……以今世眼光观之,则中国文学当以元代为最盛……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矣。使此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几有一“活文学出现”,而但丁、路得之伟业(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著作书籍皆用之,以吾国之以文言著书也。其后意大利有但丁(Dante)诸文豪,始以其国俚语著作。诸国踵兴,国语亦代起……故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几发生于神州。^[8](P14~15)

胡适的阐述侧面表明了白话文学与翻译的关系,并把中国文言的进化、白话文学的勃兴与欧洲各国“国语”文学的兴起相类比,像欧洲一样,俚语之“活文学”代替拉丁文之“死文学”,中国的言文合一

之国语是必然的历史趋势。把欧洲的古老文字拉丁文与中国的文言文相类比,把但丁、路得推行的俚语书写与中国的白话文写作相类比,施法西洋文学,文学翻译当然从白话书写做起。显然,胡适的推理是一种比较牵强主观的类比。不论胡适的结论是否客观或合理,他强调模仿欧洲的文字革命,以欧洲文学革命做垂范的意旨是非常清晰的。此后,胡适的雄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虽然丰富了文学革命理论维度,但仍是以欧洲文学的演进为例,论证中国白话文学的演进。

二、翻译思想及翻译策略

(一) 翻译思想

首先,主张翻译经典、名著。胡适屡次强调西洋文学名著对新文学创作的示范作用,翻译经典是弥补新文学创作不足的良方。谈到翻译西洋文学,他主张“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9](P67)},这个主张是与1919年2月胡适给陈独秀的信相呼应的。如果翻开胡适译文集,就会发现胡适喜欢翻译短篇小说,尤其是出自名家之手的。选择翻译短篇经典,也许出于精力不济,或急于输入西洋文学的精神的目的,但胡适这样解释:“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胡适又说:“虽未能处处与这界说相合,但是那些可传世不朽的‘短篇’小说”,绝没有不具上文所说的两个条件的。”^{[8](P125~126)}胡适的《短篇小说一集》收录了1912~1919年胡适的译作,由于历史环境的影响,胡适选译的多是高尔基、都德等名家忧国忧民的短篇小说,多带有明显的爱国主义色彩。《新青年》从第2卷第4号开始刊载胡适的《藏晖室劄记》,陆续介绍了霍甫特曼、易卜生以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作家。所谓“经济的手段”,一方面看来,由于晚清留学日本的国人较多,清末民初很大一部分西洋文学是“借桥”日本,从日文转译的,五四前后,留美学生参与到新文化运动中来,胡适、吴宓等人翻译了不少英文小说;另一方面看来,新文学创作不济,短篇翻译时效高,文学生产量大,“最精彩的”文字宜作为新文学效仿的对象。与《新青年》同时期的文学期刊,包括综合类期刊《东方杂志》文学版块,也是以刊载翻译短篇小说为主的。20年代的《小说月报》刊载的创作作品逐渐占到优势比例,但翻译文学方面仍然以短篇小说翻译为主。

其次,主张白话翻译。晚清以来,随着梁启超等人主导的“小说界革命”及国语运动的发展,白话文

运动日益深入,胡适、陈独秀、周氏兄弟、钱玄同及沈雁冰等人以同仁杂志《新青年》《新潮》为阵地,倡导白话翻译,林纾、严复等人形成的文言翻译体式逐步瓦解。早在1906年,胡适与其同学创办《竞业旬报》,先后发表的《暴堪海舰之沉没》《生死之交》《国殇》等译作就都是使用白话完成的。胡适虽然于1906年就开始使用白话翻译,但时有反复。1914年他发表在《甲寅》杂志上的《柏林之围》又使用了文言文。1916年他反复考察对比中西语言差异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欧洲各国文学革命只是文学工具的革命。”^{[10](P135)}胡适作为《新青年》的重要译者和白话文运动的重要倡导者,1919年,他开始一律用白话翻译。他认为:“翻译外国文学的第一个条件是要使它化成明白流畅的本国文字。其实一切翻译都应该做到这个基本条件。”^{[11](P4)}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及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都立场鲜明地提倡白话翻译。胡适的白话翻译理论的提出,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从梁启超提倡“小说界革命”开始,不断有人提出不同的文字改革方案。梁启超主张借鉴中国古典俗话小说中的语言,但他本人尝试了一段白话写作后,又重新使用文言写作;一批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用世界语代替汉语,这种否定本土文化的民族主义者又带有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色彩;语言学家马裕藻在章太炎“纽韵文”基础上,借鉴日文,用罗马音作为汉字注音,这种拼音被称为“国音字母”,1918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条例,刊行全国。胡适的白话文学理论与晚清到五四时期的国语运动有着密切的关联,又有着本质的不同。胡适把白话文学翻译与文学革命结合起来,把白话文运动提高到民族想象共同体的高度,从文字上改良文学,这是走向大众的有效手段,因为文学革命的真正目的是实现文学启蒙。从文学实践看,《新青年》的作者群和译者群,包括陈独秀在内,虽然都高喊“白话文学”的口号,但都徘徊在白话和文之间,胡适就曾写信质问陈独秀为何不能身体力行之。在周氏兄弟、刘半农和沈雁冰等人连续在《新青年》发表白话译作的带动下,现代白话翻译与创作得以推广和普及。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令全国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国文教材改用语体文(白话文),20年代以后的文学期刊大多采用新式排版,刊载白话翻译和创作。

(二) 翻译策略

直译的翻译策略。清末民初西洋小说翻译繁盛,但一直没有形成现代的翻译规范。晚清翻译风尚的“简介翻译、创译不分、译评合一、翻译形态的高

度中国化”^[12]这几个特征,在当时的政治小说、“鸳鸯派”言情小说、社会小说、侦探“黑幕小说”中都有所体现,以林纾翻译的小说为代表。后来新文化派树立反对这种意译的典型,许多论者直接或间接指向了林纾的翻译。

胡适的翻译方式非常接近现代意义上的直译。他在日记中曾提及:“译而失真,不如不译。”^{[13](P17)}但他强调翻译的自由度,认为达意是翻译的重要标准。五四时期,科学主义盛行,欧化之风强劲,一切都以严谨为标准,周氏兄弟等人也力推直译,后来鲁迅又提出“硬译”的原则,胡适也受欧化影响,翻译日趋严谨。他在1928年说:“近年直译之风稍开,我们多少总受一点影响,故不知不觉走上谨严的路上来了。”^{[14](P804)}五四时期直译方式的奠定,“需要等到周氏兄弟的出场。胡适本人也从意译向直译的方向发展”^{[15](P112)}。胡适认为,《短篇小说二集》“比第一集的小说谨严多了,有些地方竟是严格的直译”^{[16](P379)}。胡适把直译翻译方式与“谨严”二字相联系,一方面继承了中国古代译论的“忠实”传统,另一方面,与他严谨的治学思路是分不开的。为扩大影响力,提倡白话和直译风格,《新青年》自导自演的翻译文学史上著名的“双簧戏”值得一提,胡适也间接参与了这一论战。

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写信给《新青年》,从攻击胡适写的新诗开始,进而否定新文学翻译与创作,刘半农则以记者的身份予以反击。林纾“误入”迷局,与“王敬轩”为伍,撰文攻击新文化派。在此事件之前,《新青年》同仁已与林纾结怨。林纾的《论古文之不宜废》最先刊于1917年2月1日的《大公报》,读此文后,胡适写信给陈独秀,质疑林纾文言翻译“不合文法”,并且还指责林纾是“Shakespeare的大罪人”,因为林纾把莎士比亚的戏曲翻译成了记叙体的文言文!刘半农、钱玄同也不止一次指出林纾翻译“译评合一”的弊端,这些言论引起了林纾的怨恨。1919年4月,林纾在《新申报》发表《荆生》,讽刺谩骂新文学为“禽兽之言,乱吾清听”,并以虚拟人物“田其美”“金心异”“狄莫”来影射陈独秀、钱玄同与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对林纾的言论予以反击,引起轩然大波,最后以林纾的沉默收场。这场“双簧戏”达到了预期目的,扩大了新文学的影响,白话和直译文学得到了普遍认可。

胡适的翻译原则顾及“忠实”与“通顺”,下面以胡适译欧·亨利的 *The Rabaiyat of a Scotch Hall ball* 为例,阐释以上提及的胡适的翻译思想及策略。

欧·亨利的小说多用俗语、俚语及晦涩的“土话”,幽默诙谐之中又透出无奈的悲凉,翻译时如何灵活处理此类语言是比较棘手的。此篇的“译序”中说:“我译小说,只希望能达意,直译可达,便用直译;直译不易懂,便婉转曲折以求达意,有时原文的语句本不重要,而译了反更费解的,我便删去不译。此篇也删去了几句。”^{[16](P413)}可见,胡适的翻译策略是比较灵活的,而不是鲁迅秉持的“直译”中的“硬译”原则。在其他诗文的翻译中,也能经常发现胡适翻译的变通之处——删除、改译或加译。

他们租了两间有现成家具的房间,带一间小厨房,吉丝是过惯了乡间小市的平淡而美丽的生活的,“波西米亚”的滋味正如同加上了一点糖和香料。她墙上挂着打鱼的网,墙角放着不大正派的碗橱,她学会了五弦琴了。一星期之中,他们要出去上两三次的法兰西馆子,或意大利馆子,夹杂在纸烟的烟雾里,狂笑高谈里,长头的美术家队里。吉丝居然能喝一杯“郭太尔”酒,挑取杯里的樱桃吃。回到家里,她饭后也会吸一枝纸烟。她居然会说“吉昂第”(Chianti)的酒名了,也会随便把橄榄核抛在地上让堂馆去拾。^{[16](P413~414)}

从语言上看,这段译文通顺易懂,除了带有时代特色的词汇和个别句式,非常接近现代汉语的白话文。由于连用逗号,“夹杂在纸烟的烟雾里,狂笑高谈里,长头的美术家队里”这句不太符合现代汉语的习惯,但也可以理解。个别具有时代特色的词汇,如“碗橱”“法兰西”“队里”“堂馆”,必须回到历史的语境去理解译文。

从翻译方式上看,这段译文显然是直译,“波西米亚”“郭太尔”“吉昂第”都是采取音译的直译方法,没有破坏原文主人公固有的“小资”情调。对于专有名词,胡适进行了“篇后注”。例如,对“波西米亚”的注解为:“波西米亚”(Bohemia)本是欧洲一个国家,其地即今捷克国。欧洲有一种游民,相传多自波西米亚来,故通称为波西米亚人;颇似中国南部称“凤阳婆”一样,近世的文人画家音乐师,往往不修边幅,不拘礼法,过一种放浪自恣的生活,人称为“波西米亚”的生活。^{[16](P413)}胡适引入具有文化人类学意义的中国的“凤阳婆”一词,对术语“波西米亚”的解释既通俗,又颇具幽默风格。同样,他还注解了译文中出现的各种洋酒,一一说明其产地、特色等。从此段译文看,胡适的直译方式结合了富有现代意义的深度翻译,使译文浅显易懂且不产生歧义。

三、结语

胡适既是文学纲领的制定者,也是文学翻译和新文学创作的实践者。他身体力行,为翻译的现代转型做出了不可多得的贡献。胡适吸收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又考察了欧洲文学文字变革的历史进程,在《文学改良刍议》等文学革命的宣言中明确了白话文学的历史意义,也强调了翻译的文化建构作用。他所主张的翻译“欧西名著”的“经典化”策略、灵活有度的直译方式,以及推行白话文学翻译进行国民文学启蒙的策略,既为现代文学翻译树立了典范,也为中国本土的现代翻译理论的建构提供了宝贵资源。

参考文献:

- [1]涂兰兵. 牧师型译者: 胡适翻译思想和策略[J]. 外语学刊, 2018(6).
- [2]王海霞, 张威. 胡适实用主义翻译思想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影响[J]. 外语教学, 2018(4).

- [3]季剑青. 胡适与《新青年》的相遇: 从文学翻译到文学革命[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3).
- [4]屠国元. “外师造化, 中得心源”——胡适翻译拜伦《哀希腊》的报思想研究[J]. 中国翻译, 2017(6).
- [5]胡颂平.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增补版)[M]. 台北: 联经出版社, 2015.
- [6]陈独秀. 现代欧洲文艺史谭[J]. 青年杂志, 1916(3).
- [7]胡适. 胡适日记全编(二)[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
- [8]胡适. 文学改良刍议[A]. 季羨林. 胡适全集(第1卷)[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 [9]胡适. 论短篇小说[A]. 季羨林. 胡适全集(第1卷)[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 [10]胡适. 四十自述[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3.
- [11]胡适. 胡适译文集——外国短篇小说[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
- [12]廖七一. 《新青年》与现代翻译规范[J]. 外国语, 2019(4).
- [13]胡适. 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 [14]季羨林. 胡适全集(第3卷)[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 [15]赵稀方. 翻译与现代中国[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
- [16]胡适. 短篇小说二集·译者自序[A]. 季羨林. 胡适全集(第42卷)[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责任编辑 强 琛 E-mail: qiangchen42@163.com

Hu Shi's Modern Translation View

Sun Guangxu Li Baozh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235000, Anhui)

Abstract: Hu Shi's literary revolution programme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his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his view of world literature. Meanwhile, his literary revolution declaration also indicated the direction for modern translation. Hu Shi claimed to translate Oceana Classics to set an example for the creation of new literature and replace classical Chinese translation with vernacular translation in order to enlighten the Chinese people in literature. Hu also advocated "literal translation" with freedom, fluency and preciseness to achieve faithfulness to the original text. Undoubtedly, Hu Shi's outlook on literary revolution as well as his translation ideas and strategies is the important resources to construct modern translation norms.

Key words: Hu Shi; translation; view of modern translation